

《丘處機學案》，郭武著。濟南：齊魯書社，2009。464頁。人民幣46元。

百年來，中外學界對於道教的研究，初期及中期無疑都比較聚焦在漢末、魏晉南北朝這兩個屬於道教初創及進一步完善的階段。對於一種宗教的研究及了解，如果連其源頭及早期發展都缺乏認識，自難以深入了解其後續歷史，故早期、中期的道教研究，主要偏重在漢末及六朝時期，無疑合乎人類對於事物的理解順序及研究邏輯。等到對於初期道教的認識已有所斬獲，研究者慢慢將焦點轉移至唐宋以後的道教，自也是十分合理的發展。如是，作為中國宋代以後最重要、影響也最深遠的道教流派——全真道，順理成章地成為近三十年來道教研究者所關注的新焦點。

中外學界對於全真道的研究，大約可以二十世紀八、九十年代作為主要分水嶺。八、九十年代之前，已開始出現一些對於全真道及其文獻的翻譯和重要研究，它們對於全真道的了解，無疑具有重要的奠基及開創性價值；不過，相對於全真道深刻、多元、複雜的悠久歷史及其深廣影響來說，上述研究畢竟還是比較零散、概略，缺乏全面性的深度。八、九十年代以後，學界對於全真道的關注及研究，開始呈現出質與量上的巨大變化，實有飛躍性的成長及進步，可歸納為如下數項：一、有關全真道的碩、博士學位論文大量增加；二、有關全真道的專著及專題論文大量出現；三、有關全真道之基礎文獻的搜集、整校更為完備；四、有關全真道的專題學術會議，已多次舉辦；五、有關全真道的專門研究機構、專門叢書和期刊陸續出現。

丘處機作為帶領全真道走向鼎盛時期，且對金、元、蒙古歷史的發展曾發揮重要影響力的全真道士，一百多年來，對其研究，不僅是所有全真道人物中最早，且就份量來說，相較於創教者王重陽，恐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學界早期對於丘處機的研究，泰半集中在《長春真人西遊記》一書，以及他與成吉思汗的關係和他對當時歷史、政治的影響。換言之，對於丘處機的早期研究，主要是從歷史、地理、文化、政教關係及中西交流史等取向切入，而較少從道教或全真教的角度著手。近二三十年來，對於丘處機的研究，除上述特定的研究取向及內容外，已擴及到他的生平事蹟及文集論著考證、詩詞文學造詣及思

想、修道歷程和思想、齋醮活動及思想、內丹、養生和宗教、哲學思想，以及其對全真道、龍門派發展的貢獻和影響等各個方面，並且還有多種對於其生平事蹟及思想的全面性介紹和探討的論著。大致來說，學界至今為止對於丘處機的研究，已深觸其各方面的問題，並已積累相當豐碩的成果。¹日後還有待加強努力的地方，應是對其內丹思想、生命觀、形上學、宇宙論、生死觀、齋醮、戒律、宮觀制度思想等等問題之更為精深的闡釋及探討。

郭武所著《丘處機學案》一書，係由張廣保主編、香港青松觀贊助出版之《全真學案》第一輯中的一冊，故此書的體例、內容及宗旨，和該系列的其他學案基本一致，主要是由生平、思想評傳、年譜、著述輯錄、參考文獻及附錄（相關研究成果目錄）等幾大部分所組成。且《學案》的根本宗旨，並非在針對案主進行專門、精深的研究，而是在向讀者引介各案主的生平、思想和研究現況，提供其著作的理想研讀版本，以幫助「國內外學者及道教愛好者進一步深入地瞭解全真教」（張廣保：〈總序〉，頁4）。作者在撰述此書之前，早已寫過多種有關全真道的論著，並吸收、利用了前人的研究結果，使自己的論述更為縝密、周延。

郭武在《丘處機學案》中所撰寫的〈丘處機評傳〉一文（頁1-151），總共分為「入道與修行」、「濟世與度人」、「著述與思想」、「法嗣與支流」及「丘處機年譜」等五大部分。在「入道與修行」一節，主要析介丘處機的家世、出家、拜師、從師及隱居磻溪和龍門洞苦修的艱辛歷程。作者以為，在經過磻溪及龍門洞十三年的苦修後，丘處機的道業已得大成，故得以進一步出山以濟世度人（頁22）。作者在此節有關丘處機四十歲前之事蹟及修道過程的析介，基本上已相當完整，並已大致吸收前人的各項研究成果。唯其中有些用詞及觀點，筆者認為有值得商榷之處，茲分述如下：

¹ 中外學界百餘年來對於丘處機各類研究論著，郭武《丘處機學案》一書的〈附錄：有關丘處機研究之成果目錄〉（頁427-464），儘管仍有缺漏，但已大致搜集完整。作者若能針對歷來的研究情形進行分類整理，甚至加以評述介紹，則對於讀者來說，更具有導引價值。只是，這會牽涉到所有《全真學案》共同的撰寫體例問題，並非作者個人所能獨自處理。

一、書中提到，王重陽在「活死人墓」修煉三年(頁4)，和《重陽全真集》卷二「活死人引子」中所說的「二年餘」，有所出入。且作者主張，王重陽在「活死人墓」上所豎立之「王害風靈位」紙牌，「意在引人注目」，而其填掉「活死人墓」，轉赴劉蔣村築庵修行的主因，在於「少有人回應他的行為」。如是說法，實完全忽略王重陽「活死人墓」修行中所隱含之「埋葬舊有生命，獲得脫胎換骨之重生」的深刻意涵。²此外，王重陽在「活死人墓」上所豎立之方牌，並非作者所言之「紙牌」，「紙牌」極易毀壞，故言「紙牌」，恐不符事實。而此靈位為「王公靈位」，非作者所言之「王害風靈位」。

二、書中多處使用「靈魂不死」一詞來表現全真道成仙思想之不同於傳統道教「肉體成仙」思想的革新處(頁6、71)，且認為唐前道教所強調之守一、存神、胎息等等修煉方法，皆主張「肉體成仙」，如是用詞及概括性說法，亦有待商榷。「靈魂不死」一詞，係作者所自擬，欲以此來對照及區別早期道教追求的「肉體成仙」，但「靈魂」一語絕少為全真家或其他道教流派所使用。雖然作者在一些地方，曾將「靈魂」等同於「精神」，靈魂不死即代表精神不死，但若以此語來概括全真道所主張的「元神」或「真性」不死，恐怕仍不太適切。再者，類似守一、存神、胎息等修煉方法，是否都能和外丹家所追求的長生不死一樣，皆以追求「肉體成仙」來概括，亦有值得討論之處。比如，主張守三一法的《金闕帝君三元真一經》中即提到：「氣結為精，精感為神，神化為嬰兒，嬰兒上為真人，真人升為赤子，此真一也。」類似的說法，在許多上清派存思經典中都可見到，如是成仙思想，顯非簡單的「肉體成仙」一詞所能概括。

三、作者認為：「色身、法身之薰蒸關竅的行為，蓋屬全真道的煉命功夫。」(頁16)此語係在解釋丘處機的「壯貫皮囊，薰蒸關竅，圖使添津液。色身輕健，法身容易將息」一語。但該句只是在強調食物可以「壯貫皮囊，薰蒸關竅」，並不涉及全真丹道命功的修煉，且法身的修煉，已屬性功以上之事，故作者此語，恐有所不妥。

在「濟世與度人」部分(頁22-56)，作者主要闡述了丘處機四十歲

² 蕭進銘：〈光、死亡與重生——王重陽內丹密契經驗的內涵與特質〉，《清華學報》，新37卷，第1期(2007)，頁93-102。

修道有成後，在陝西祖庭、山東故鄉、西行見成吉思汗，及生命最後數年在燕京推廣教務、濟世度人的種種事蹟。作者在此部分的考證及闡述，相當完整詳盡，惟需再作斟酌的地方如下：

一、書中提到丘處機面見金世宗時，「已休糧辟穀」（頁28），如是說法，恐有問題。蓋《磻溪集》卷三所見之〈世宗挽詞〉，只言及「處機不食茶果十有餘年」，並未言其「休糧辟穀」，且無論是在丘處機的其他著述及相關的文獻當中，亦未見此說。

二、作者另還提到，丘處機所撰〈世宗挽詞〉是在為「全真道發展失去政治靠山而悲」（頁30），如是說法實難從詞意當中讀出，不知根據為何。若以此說法來詮解丘處機〈世宗挽詞〉中所表現出的哀戚之情，套用作者於頁52中所言，實以「功利的眼光來審視丘處機」，其是否恰當，當有再加衡量的空間。

在「著述與思想」一節（頁56-89），作者首先對署名丘處機的各種著作略作考述，然後再從宇宙與人生、無為與有為、修性與煉命及倫理與政治四個面向，精要闡述丘處機的重要思想。如是工作，唐代劍的《王嘉、丘處機評傳》一書已有所嘗試，郭武此處的歸納及闡述，除了吸收唐書的研究成果外，也提出不少更為周延和深入的觀點。筆者以為，郭武以此四點來析述丘處機的思想，實可稱為完備，其闡述的內容也頗能精要指出丘氏思想的重要觀點，只是其中的一些說法，仍有進一步探討及深化發展的空間，茲分述如下：

一、針對《大丹直指》是否為丘處機所撰這一問題，作者並不認同戈國龍的論斷，³認為該書或許不是丘氏所親撰，但仍能「某程度反映丘處機的主張」（頁81）。筆者以為，除曾針對戈氏的某些論點提出反駁外，作者並未確切提出任何正面有力的論據證明《大丹直指》一書的丹法為何能反映丘處機的主張。再者，若《大丹直指》一書真能「某程度反映丘處機的主張」，作者在書中也未曾進一步闡述其與丘處機《磻溪集》（特別是〈青天歌〉）中所呈現的內丹思想有何共通處。故針對此點，作者實有必要作出更多的論述及說明。

³ 戈國龍認為《大丹直指》一書不僅不是丘處機所作，且亦不是全真道的丹經。詳參戈氏：〈《大丹直指》非丘處機作品考〉，《世界宗教研究》，2008年第3期，頁43-50。

二、關於《攝生消息論》一書是否為丘處機的作品，作者只引用《四庫全書總目》的說法，並未作出明確論斷。筆者以為，於此處實可進行更多的討論、考據，並得出較明確的結論。《攝生消息論》一書，其關注焦點、思想內涵及寫作風格完全不類丘處機《磻溪集》等著作，且無論教外或教內資料，也從未提及丘氏曾撰寫過如是著作，故幾乎可以確定該書並非丘處機所作。

三、丘處機在世之時，曾從事不少齋醮濟世活動，其對於齋醮儀式，亦有獨特的觀點及看法，屬於其思想的重要一環，但作者在書中，並未作專題分析、討論，若此書有機會再版，實可考慮補入。

四、作者對丘處機的認識論及心性論思想的闡述，常建立在西方哲學的主、客二元對立的基礎上，如是運用是否切當，實有討論的空間。蓋作者既認為丘氏的認識論具有「神秘色彩」（頁69），即密契主義(mysticism)式的認識論，此種認識論最根本的特質之一，便是超越主客二元的對立，達到與終極實在(ultimate reality)的統一。但作者一方面使用「神秘」這個字眼，另一方面又落入主、客二元的框架，實有矛盾之處。再者，丘處機的「道」、「心」、「性」等觀念，都具有絕對、超越時空、形象、感覺、思慮的特質，如是認識論及存有論，實已超越主客二元分立的思維，故以西方主客二元的觀念來詮釋，恐需再斟酌。

五、作者在評論丘處機的倫理思想時，認為其超越是非、對立的觀念，「無非是要求廣大民眾承認現實世界的不合理現象，放棄改變社會秩序的想法和做法，以求維護當世統治者的利益，進而為全真道的發展贏得支持」（頁87）。作者在作出上述詮釋及論斷時，事實上只舉了丘氏曾幫助金廷招降義軍的例子來支持，證據實太過薄弱。蓋此案例，若從招降、息戰將可避免更多殺戮和傷亡來看，實更符合修道有成後之丘氏的本懷、初衷，並不一定要從作者的角度來詮釋。作者在評論丘氏的西行壯舉時，曾經強調，此事並不能以功利的角度來看，而應從其濟世救民之心來理解（頁52）。對同一位丘處機，書中卻出現如此不同的詮釋，實不免有些矛盾。再者，如果丘氏的倫理思想真如作者所言，那他又為何要勸誡成吉思汗減少殺戮、提倡孝道及敬天愛民？故作者的詮釋觀點，實有討論的空間。

在「法嗣與支流」(頁89-129)及「丘處機年譜」兩部分(頁129-151)，作者立基在前人研究及自己精細考證的基礎上，整理及闡論皆十分全面及完整，很有參考價值。唯一美中不足之處，係缺少專節處理析論丘處機對後世的貢獻及影響。比如，丘氏在全真龍門之戒律、齋醮及宮觀制度的建立上，到底發揮甚麼樣的影響，應是丘處機及龍門派研究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，但截至目前為止，還未見到精詳的研究。當然，資料文獻的不足，也是主要原因之一。

總括來說，作為一本全面性評述丘處機之生平事蹟和著述思想的論著，以及提供研讀丘處機著作理想版本的工具書，郭武所著《丘處機學案》一書，其實已做了很好的工作，且有超越先前類似著作的地方，值得向大家推薦；只是其中的一些論點及問題，或有需要進一步斟酌和補充的地方。依筆者個人的研究經驗，類似王重陽、丘處機這樣一些以內丹修煉為主的人物，無論其宗教、哲學思想，還是其種種行為、舉措，皆和其在內丹修煉中的體證經驗密切相關。因此，如果我們未能深入和準確掌握其內丹思想及修證經驗，則不僅不易貼切地評述其思想言行，而且還很容易出現扭曲或錯解的情況。如儒家思想傾向濃厚，且不太喜歡內丹煉養的陳教友，在《長春道教源流》一書中所作出的論斷：「全真本不言煉養、服食」，「王重陽有宋之忠義也。其害風也，蓋憤激使然。……重陽不惟忠憤，且實曾糾眾與金兵抗矣」。因此，研究及評論王、丘這樣的內丹人物所面臨之最大難題及挑戰，並非在其生平事蹟及著述影響的考證上，而是在其內丹思想及修證的理解及詮釋上，如果這個難關沒有獲得很好的突破，則對其析介和評論，便不容易鞭辟入裏、一針見血。但問題是，截至目前為止，學界對於王、丘等人之內丹學的研究，其實還相當不足，這也是在對全真人物之生平事蹟的研究愈加全面、完整之後，所應當進一步努力的方向。

蕭進銘

臺灣真理大學宗教文化與組織管理學系